

曾国藩全书

曾国藩

读书世界



〔下〕

远方出版社



曾国藩全书

主编 梁 勤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阿荣

曾国藩全书

主编：梁 勤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16.5 字数：5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 - 80595 - 769 - X/K·27

定价：748.00 元（全 25 册）

目 录

卷 首	(1)
求阙斋记	(3)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言选	(4)
编者的话	(5)
第一章 求阙斋日记选	(7)
一、按语	(7)
二、“求阙斋”自解	(7)
第二章 读书世界	(80)
一、世代为农耕读风	(80)
二、童蒙塾读露头角	(89)
三、发奋图强早立身	(97)
四、跻身皇家翰林院	(121)
五、十年京官狠读书	(134)
第三章 曾国藩读书经验	(157)
一、广为积累学有成	(157)
二、经邦济世求学问	(171)
三、《船山遗书》始问世	(186)
四、教子读书为传人	(206)
五、为学之道新、独、特	(219)

六、活用朱子读书法	(242)
第四章：读书事例及分析	(258)
一、品诗滋养精气神	(258)
二、勺水天地翻蛟龙	(270)
三、心身两润始创业	(278)
四、大道忌巧书为用	(282)
五、风雨人生伴读书	(289)
六、读书向心成集团	(293)
七、读书风范泽后世	(297)
八、宦海终生书为伴	(299)
九、活用《杂钞》好为政	(305)
十、曾国藩学术及观念	(309)
十一、曾氏读书概述	(324)
第五章 曾国藩杂著选	(342)
一、笔记	(342)
二、限期功过章程	(360)
三、初定营规(二十二条)	(363)
四、营规	(365)
五、保守平安歌三首	(368)
六、水师得胜歌并序	(371)
七、陆军得胜歌	(373)
八、爱民歌	(376)
九、解散歌	(378)
十、格言四幅	(380)
十一、书赠仲弟	(381)
十二、劝诫篇	(383)

十三、直隶清讼事宜十条	(392)
十四、伎求诗二首	(400)
附录：三场辛苦磨成鬼，二字功名误煞人——简述清代科举制度	(403)

第三章 曾国藩读书经验

五、为学之道新、独、特

1. 学风正派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平常人总会以为做学问就是读书，书读好了，就会有官做，做得官了，则富贵利禄，乃至声色货利，都会源源不断而来。所以，有一句格言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就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乃至更长的时间，一般人对于读书的观念。因此，读书一事，所以会占整个学问的领域，也无非为此。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在封建社会，做学问就是读书，读书就可以升官发财。虽然这句话固然不能包括过去或者现在的一切学者，但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一般读书人的普遍心理。所以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读书这件事在社会上的确看得很重要，然而读书人越多，社会和国家只有弄得愈糟，寻根究底，不能不归结到读书的目标问题。若人们

总是以“颜如玉”、“黄金屋”为读书目标，当然时时刻刻对目标之追求，就成为社会的一种共同趋向，人人都如此，读书的评判标准与价值取向就会发生背离，社会自然就不知会变成个什么样子。

曾国藩数十年来，虽在戎马倥偬之中，而读书为文不辍，其教生徒、教门僚、教子弟的读书方法，的确十分的独到而又全面，既亲切踏实，而又可为后进入学之门。不过，我们从曾国藩任官出京师以后，他再不主张读死书，更不主张拿读书做寻求官阶的工具。他认为读书是做学问的一部分，而做学问的目标，则应在“化民成俗”。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统治阶级已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政治黑暗，军备废弛，财政空虚，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更加恶化，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当时才情横溢的龚自珍写下了著名的《尊隐》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年轻的思想家敏锐地指出，中国封建王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惨惨日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中国封建制度古老的船体，在历史潮水二千多年来的浸润与冲击下，已经从里到外彻底腐朽了。但它还不甘心沉没，在夹岸的风雨与满江的惊涛中仍然拚命地挣扎着。而恰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躯体正在加速它溃烂的时刻，世界第一号资本主义强国——英国资产阶级将它的触角伸向了东方，并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从此，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社会跌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可以说曾国藩所处的社会，是人民革命的风雷、侵略者的贪婪攫取、统治者的荒淫堕落，在疮痍满目的中国大地上交织成一幅怵目惊心的图画。那个时代从总体上说，士气颓丧，读书人除帖括诗赋之外，已不知何为学问，除了欲得举人进士之外，已无所谓志向。所以，曾国藩在深入社会、了解社会、作用于社会的实践中，已逐步跳脱科举

的藩篱，开始着意挽回士子的颓风，并先由自己做起，推及他的士徒与子弟，然后由近及远，以造成一个良好风气，正风俗而救人心。虽然事体甚大，但是他相信只要有一部分人在那里真能以身作则，真心倡导传播，则亦未尝不可以“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曾国藩说：“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渚，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如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在曾国藩看来，此事虽然甚大，但只要去做，去努力实践，效果倒也是能取得的。所以，他说：“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还说：“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因此，要想做“化民成俗”的事业，固然不可以不读书，但是专读死书，是不会“化民成俗”的；虽不读死书但无远大的志向与抱负，也不能“化民成俗”的。所以，曾国藩根据自己读书生涯的总结，认为读书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志大人之学”。他说：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工夫，志大人之学。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闵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虽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志，卅岁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事小事均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这里所举的都是志大人之学之事。所谓大人之学，其中说得十分具体，民胞物与之量，内圣外王之业，使匹夫匹妇，皆得其所。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这是何等盛德大业，岂是读书求官求荣之辈所能企及，又岂是终日占毕咿唔于诗赋帖括者所能望其项背。然而，同一读书，或彼或此，便是所谓坚卓之志的作用。大凡人们读书，一般都是有一定志向的，但从曾国藩看来，志大人之学者才算称之为志。即使是志在升官发财，诗赋帖括者，也何尝不日夜孜孜以求，要达到他的这一志向。因此，在读书之始，假如不把志向定得正大，则其流毒将不堪闻问。好像是张蒿庵说过这么一句话吧，“学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乱之源，生人忧乐之本矣”。所谓一日之志，这里应该指的是学者读书为学之初，自己所期望于自己的，究竟是朝何目标发展与进取，是内心为何而奋斗的愿望与理想。这种目标与愿望若在于自己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一族之荣辱，他就不会关心世俗之荣辱得失，难以以天下为己任，这样的读书人不得志算老天有眼，一经得志，便要地无皮了，肯定会天怒人怨。假如志向与目标以及愿望在民胞物与，悲天悯人，那么所谓得志与民同之，不得志修身自好俟于世。无论在上在下，都可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才算得是学者正经，读书才会得以发挥和派上用场，也可以为达到上述目标和愿望更需要自己不断地读书。有了这种志向和愿望，虽然自己气质

稍下，也可以借读书加以改变。这并不是说书籍就有这么大的力量，都可以将人改变，要不然古今读书人都应入圣贤之域了，又何以在读书人中产生那么多的大奸巨猾，这些人大多不都是满腹文章吗？因此，这就是说书要看什么人读，大奸巨猾心术不正之人读之，则书中所载，大都可以为其奸猾之资、阴谋之本。以民胞物与为怀、以天下为己任者，则圣贤之言，皆我之言；书中之事，皆分内之事，自然会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尧舜、不如周公者，而求其所以为尧舜为周公者。孜孜矻矻，朝乾夕惕，则未有不能达其愿望和理想的。而他努力和为之艰苦奋斗的地方，则在自己有十分坚韧的志向。所以，曾国藩所说的立志就是换骨之金丹。然而，所谓立志，又不是朝三暮四，或作或辍，一曝十寒所能奏效的，必须朝斯夕斯，抱定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然后才能不希望其速成，不为势利所诱惑。所以，曾国藩经常在立志之下，特意加上“有恒”二字，意思就是说读书的志向必须有始终不懈的精神。这在曾国藩读书生涯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2. 坚持不辍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见识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

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廿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廿卷，《后汉书》百卷，皆硃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精进，况六弟、七弟上等之资乎……诸弟试将《朱子纲目》过笔圈点，定以有恒，不过数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经亦不过数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即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书；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兄日夜悬望，独此有恒二字告诸弟，伏愿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不但把有恒的效用说得很详尽，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为诸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不但他的诸弟可以受益，即使今日我们仍可领会到其中有益的东西。他所举有志、有识、有恒，自然都是读书应有的先决条件，不过“有识”不是初学所可立即掌握和达到的，所以曾国藩平时教人，总是以立志有恒为最要。然而，能立志而又能持之以恒，时时不断地与古人为俦，当然就会知道学问无尽，不致以一得而自足，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之陋或者即可因此免除吧。一般说来，在读书治学上最为担心的恐怕就是立志未必坚定，见左右前后与自己相仿佛者，皆得奥援而腾达了，于是自己也就耐不过了，或望其速成，或诱于势利，或竟抛弃自己原来一直所学习和研究的东西而另觅蹊径，这在曾国藩看来，统统都叫做无志，都叫做无恒，就免不了河伯观海、井蛙窥天了。曾国藩在写信给他诸弟时，正是在京城做京官的时候，也可以说正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将前面几章加以回顾，就可以看出他在不长的几个月内，做了许多功课，读了许多著作，我们或者会惊疑他是天才独

厚非常所能比吧！其实这绝对不是，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平平并不过人，他惟一的长处就是他那种诚拙的精神，困知勉行的精神；坚持不懈、无稍间断、一往无前的精神。在常人看来，每日看二十页书，并不算什么难事，简直太容易，要求太低了，但一般人就不能有他那样的成绩，这恐怕便是常人缺少他那种有恒的精神。假如大家都以曾国藩读书精神为榜样，也立定志向，并持之以恒，每日按他所定的标准看二十页书，几个月下来，成绩也定可观。若年年如此，终身如此，何患无所精进与收获。荀子说：“无冥冥之事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曾国藩科举成名，做了京官后，已开始摆脱科举之藩篱，在这个时期，正是他砺志潜修，冥冥昏昏的时期，凡是后来那些昭昭之用，赫赫之功，可以说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即使他几位弟弟后来的功业声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个时期作为兄长的不厌其烦、真心实意的教导与劝勉。所以，凡是有志于宏伟事业者，不可不立定坚卓的志向，尤其不可不持之以恒、无稍松懈的恒心。

从曾国藩的成就来看，有了坚定卓远的志向，不断的恒心，然后就会感觉和内省到自己道理还不很充实，知识还不够深远，才智与能力还不足以应用，摒却功利，抛离浮躁，找出自己的不足和缺陷，那么就可以谈读书的问题了。因为带着这种如饥似渴的心态去读书，才会是发自内心的正当的需求，才不至于藉书中之义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和满足个人的私欲。即就读书本身来说，在具有良好心态和恰当时机的情况下，其理解力、运用力都必然比那些无目标志向的时期要强大得多。不过中国典籍汗牛充栋，人们把书籍与知识比作宽广无边的海洋，确实是再恰当不过。因此，中国向来有一句古话就是读不完的书。在茫茫大海中，航道

各异，目的不同，道路阡陌，万径千蹊，莫知所适。在读书之前，假如不指以正当的途径，则将以羊肠小径为阳光大道，以断港绝潢为终南捷径，则将皓首穷年，不免为俗夫陋儒而已，所以，曾国藩认为在立志、有恒两问题决定之后，还要辨明应该采取什么趋向，也即是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3. 把准方向

曾国藩关于这个问题在他的整个著作中说得最多，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他做过如下述说：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世，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俱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覆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

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这一段话，若拿现在的眼光初略地去看，似乎会觉得有些迂腐了吧。其实所谓耳、目、口、体、心、思各尽其职，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人类的一般行为基本上也就指的是这些东西。一般的人或者因为环境关系、教育关系而不能完全如此，历代读书人向以先知先觉为职责，当然应该以儒家伦理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就必然以此为急务。所以，一般我们常说的腐儒，以规行矩步坐尸立斋种种形式，自矜为义理之学，而其心术有时不堪闻问，于是义理二字变成迂腐虚伪之代名词，理学先生便成了古董。提及义理二字，或者就会引起人们联想到那种迂拘腐朽的形态，这实在不是义理之过，应该是那些欺世盗名、披义理外衣行阴谋祸心者的过错。我们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伦理道德来分析，义理的内容，就是立身为人之道，成己成物之方，至于用何方式以立身为人，以成己成物，则尽可随时代以变迁，随环境以变迁，要其归则始于正己，终于济世，如百川异派，同达于海差不多吧。所以，开始之初不必拘于一定方式，一定途径。曾国藩所说的立志以植根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过去人们所说学有本源，便是指的这些内容。有了这个本源，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自己之所见，证实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所谓求辞章者，使自己之所获，达诸笔筭而不差，则天下无往而非学，无事而非学了。到了这个时候，到了此种境界，虽曰六经皆我注脚，也无不可。

以上所归纳和列举这三个读书的先决条件，在曾国藩的全部著作中，并没有这样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不过在他的言论和著述中，归纳起来，则可以得出这三条是读书应有的先决条件。虽

然还可以罗列出一些，但这三条则是最主要的精华所在。因此，这三条于读书为学之始，关系极大，它是解决读书认识问题的，是读书为学的本源与原动力。不过说是先决条件，并不就是一开始就能定下来的，而是不断在读书过程中形成、发展、巩固起来的。这三个条件在曾国藩的读书生涯中则能自始至终坚持之、贯彻之。

4. 讲求活读

观察一个人的读书方法，可以看出他的读书兴趣和其造诣的深浅。这句话固然不可当作绝对的评判标准，但大致上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或者说无甚误差的。从前，私塾的教师教不谙世事的小学生死读《大学》、《中庸》一类十分深奥的书，并教育他们先要安详恭敬。不从，则临之以夏楚，动之以鞭笞，所以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学生，乃视读书为畏途，我们从过去的小说、传奇以及教育史料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证。这是旧的教育方法或者说指导读书的方法影响儿童读书兴趣。因为没有良好的方法，而书又不可不读，于是有一大批读书人尽量地死读书、读死书，到头童齿俗，而一般应试只数百字时文，乃有未通顺的，或者读书数十百卷，关键时刻而无一句能帮助其应用的，皓首穷经，结果是一点成果都没有，自己到死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归结起来，除了旧的教育制度本身外，也可以说应该算是方法下的牺牲品。曾国藩为时代所限，积习所限，他所领悟、总结并列举出来的读书方法，当然与现代教育理论相差一段距离，或者说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但是，踏实拙诚则是本质决定了的，由于踏实拙

诚的本质，于是便产生曾国藩实事求是的读书方法，这是许多研究曾国藩的学者所总结出来的。因为读书是一件扎扎实实的，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和智慧的事情，它最忌投机取巧。取巧固然有时可以得到书中一知半解的皮毛，若想求深造，求本源，求前人未发之秘，求本人创新之见解，求独成一家之言，都是绝对不能存在丝毫取巧之心的。不但不能取巧，凡学术造诣愈深者，经常用力愈拙，着力最勤。近代世界上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往往为发明一种新理论，不惜穷毕生之力以求证据，必须等待数十百千证据都相同了，然后才敢自信，才敢公诸于社会。其实我国的清代考据学很有成就，乾嘉时期则成为显学盛极一时，但这些汉学大师们也常为一字一义而求数百证据。在一些聪明人看来，不是太拙笨了吗？其实这只看到其表面，而不知这批经学大师们的造诣和成就，就是从这拙中得来。许多聪明人头脑异常的灵活，举一反三，一通百通，但很少有成就，可能就在于异常的浅薄，就是因为不愿用这种拙功夫。况且书中的旨趣与精神，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深者得深，浅者得浅。精蕴之处，光靠别人指点是不行的，全要自己去求得，这样得到的东西才为自己所有，书中的精神就可以说被掌握了。父兄师友虽毫无保留地拿他们自己的心得体会来告诫劝诱，但只能起到启示启发的作用，与自己经过阅读、理解、思考、总结得来的，意义迥然相别。如此说来，那么读书可以只下拙功夫就不用讲求方法了吗？这可能也有不同的回答。

方法好像是指示一个方向，告诉人们这个方向道路上，有什么河溪，有什么山谷，应该坐车还是应该坐船，至于沿途的风景如何美丽壮观，便要你自己去看才能亲切才会有深刻的感受。有些人说方法又如地质勘探者告诉人们矿床的所在与开采挖掘的方